

# 行会理念、阶级意识与党派政治： 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变动<sup>\*</sup>

霍新宾

**摘 要：**“劳资合行”即劳资双方共生于同一行会，此种“劳资共同体”的行会组织结构决定着广州传统劳资关系的主题生成，“浑然相处”而“无劳资阶级之观念”。然而，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党化渗透，广州劳资关系遂由“劳资合行”的行会特质向党派政治属性演进，协商合作与阶级斗争构成此时劳资群体互动的双重主题。但这两种主题并非固化，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发生波动。从这两种主题演绎所致广州劳资关系格局由劳方至资方权势转移的事实中，可以窥知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围绕劳资问题的复杂利益博弈，以及传统行会近代转型时劳资阶级意识分野的诸多关联。

**关键词：**国民革命 劳资关系 行会 国共党争

传统行会作为“旧时工商业劳资间共同的组织”，<sup>①</sup>是中国近代劳资关系发育的土壤和原始起点，而国民革命时期则是中国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特质向近代转轨的重要阶段。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这一社会剧变时期的劳资关系，虽以工运史、劳资双方与国民党政权互动等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sup>②</sup>但多侧重于劳资对抗而甚少论其合作，特别是对劳资关系由行会特质向近代转轨的复杂样态的关注尚付阙如，而广州则提供了典型的考察样本。国民革命时期的广州不仅是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1BZS046）、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①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41页。

② 其代表性成果有：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ans. H. M. Wright,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1975;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明达、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3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棚倩红、卢权：《北伐出师后的广东工人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裴京汉：《北伐初期广东地区的劳动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应对》，《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张培德：《略论二十年代上海的劳资关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8—37页；朱英：《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8—351页；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6—153页。

当时国内最具传统行会色彩的典型城市,<sup>①</sup>也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这里不但素有中国工人运动“发端最早”和“最发达”之誉,<sup>②</sup>而且还是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策源地。以上这种传统与现代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共生,与政治革命造成的社会剧变交织,共同演绎着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特质向近代的转轨。那么,这一时期广州劳资关系是如何变动的?尤其是针对来自国共两党的政治形塑,劳资双方是怎样因应的?国共两党又是如何应对的?其应对有何差异?这些问题的明晰,可以丰富我们对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曲折性的认知和评析,从而梳理出工人、商人与国共两党间微妙而复杂的利益博弈,进而透视传统行会近代转型时劳资阶级意识分野的诸多关联。

## 一、劳资合行：前国民革命时期劳资关系的行会特质

研究中国近代劳资关系的孕育、形成与发展,首先要从行会时期“劳资合行”的组织结构说起。所谓“劳资合行”即劳资双方共生于同一行会,且在行会中雇主因社会经济地位而往往起着支配作用。<sup>③</sup>这是中国传统行会作为“劳资共同体”组织结构的基本特点,<sup>④</sup>也是广州早期劳资关系的主要组织形态。著名的广州“七十二行”就是由工人和雇主共组而成。<sup>⑤</sup>鸦片战争时期,广州石行的“西家行”、<sup>⑥</sup>“东家行”共存即是例证。如石业行会分城东、城西、小北三埠。行内再分东西家行。其会员若违反行规不听调解即除名,“如属西家则无人雇用;倘属东家则无人替他做工”。<sup>⑦</sup>石行行规森严可谓是中国传统行会自我约束机制的典型体现。“省垣工艺如云,操作之徒,各行皆置立会馆,议定行规,公举行老董理其事。一行之中,凡货式之大小,工资之多寡,均有定章。同行各人共相遵守,不容淆混,倘有违例者,无论东家西家行众,定必鸣鼓而攻,不遗余力。”<sup>⑧</sup>广州行会正是依凭这种“鸣鼓而攻,不遗余力”的约束机制,来维护东西家利益,藉以维系其在城市社会经济中的垄断地位。

当然,上述东西家分立共处同一行会的情形并非限于石业。其实,此“劳资合行”的组织结构在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玛瑙、篷厂、靴鞋、花梨、建筑、云母、首饰、戏班、搭棚、牙擦、制香、玻璃樽、车木、土烟丝等行业亦相当普遍。(见下表)

- 
- ① 据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员对广州工会的调查显示,80%多的工会具有行会性质。参见 *Labour Situation in Canton*, The Hankow Herald, August 4, 1926, Jay Calvin Huston Papers, 1917-1931, Box 5, Folder 4,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 ② *Labor Conditions in Canton: A Statistical Study*, June 1929, Jay Calvin Huston Papers, 1917-1931, Box 5, Folder 1,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p. 516; 余启中:《民国十二年至廿二年广州劳资争议底分析》,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4年,第30页。
- ③ Paul Scharrenberg, *China's Labor Movement*, 1931, Paul Scharrenberg Papers, 1893-1960, BANC MSSC-B906, Carton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藏, p. 4.
- ④ 参见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上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78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劳工运动史》(一),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9年,第39页。
- ⑤ Edward H. Lockwood, *Labour Unions in Canton*, The Chinese Recorder, July 1927, Jay Calvin Huston Papers, 1917-1931, Box 6, Folder 3,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p. 401.
- ⑥ “西家行”指劳方行会。
- ⑦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2页。
- ⑧ 《羊城新闻车料争讼》,《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4月28日,无版码。

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行会“劳资合行”概况一览表

行名	东家行	西家行
玛瑙行	名映霞堂，在下九甫，共8家	名霖璋堂，在西关石榴巷，行内又分霖源、龙璋两堂，约400人
篷厂行	分三堂：太古堂，在河南；① 慎公堂，在西关；联胜堂，在东门口。约10000人	分正义、德尊、十字、江门四堂，共60000余人
靴鞋行	名敦和堂，在濠畔街，共800余人	分券鞋、上鞋、裁底、戥底、扣镶五行，共3000余人
花梨行	名务本堂，在小新街	分两行：笋头行笋胜堂，在华德里；抖行永胜堂，在小新街。共2000余人
建筑行	名大安堂，共3000余人	分五市十堂：禺山市有继义、慎远、南胜、顺和四堂；归德市有成德堂；城南市有城南堂；太平市有桂溶、楠安两堂；三角市有联福、桂源两堂。共50000余人
云母行	名云珠堂，在大新街和宁里，约200余人	名联珠堂，在大新街和宁里，约2200人
首饰行	名兴仁行	分公益社、立本堂两堂，约3000人
戏行	名吉庆公所，在黄沙	名八和会馆，由永和、兆和、福和、申和、庆和、德和、普和、顺和等八堂合设，在黄沙。共2700余人
搭棚行	名岐兴堂，约600余人	分联益、正义两堂，共1600余人
牙擦行	名允和堂	名善育堂，共1000余人
香行	名同福堂	分线香永福堂、塔香永义堂两行，共3500余人
玻璃樽行	名启明堂，在杨仁里，共60余家	名明远堂，在杨仁里，约300余人
车木行	名全福堂	名全义堂，约1000余人
土烟丝行	名崇安堂，在白糖街，约100余家	名协成堂，约1200人

资料来源：邓铁锋：《广东劳动业务之调查》（《工界》第10期，1920年8月1日，第19—22页）；《广东各工行状况之调查》（《工界》第11期，1920年8月14日，第13—15页）。《首饰行工人生活状况》、《鞋行工人之生活状况》、《戏行工人之生活状况》、《搭棚工人近况》、《牙擦工人之生活及其罢工原因》、《香行工人之悲观》、《玻璃樽行工人之生活状况》、《玛瑙行工人最近之生活》、《车木工人筹组工会》、《土烟丝行工人之生活状况》。（分别见《广东群报》1921年2月28日，第3页；3月4日，第3页；3月8日，第3页；3月25日，第6页；3月29日，第6页；4月7日，第6页；4月8日，第3页；4月15日，第3页；5月31日，第6页；6月7日，第6页）

由上表可知，在东西家分立的广州行会组织结构中，东西家的行名多是以“堂”来命名。东家行以单一堂号为主，不过其构成并非全是雇主，有的则因西家加入而为劳资混合体。如花梨行东家行务本堂，“西家亦得人之”，<sup>②</sup> 车木行东家行全福堂则为东西家合组所立，<sup>③</sup> 而牙擦行东家行允和堂则是由西家行善育堂分化出来的工人所建。<sup>④</sup> 至于西家行则以复合堂号居多，如玛瑙、篷厂、靴鞋、花梨、建筑、首饰、戏班、搭棚、制香等行业的西家行就是以行内又分若干堂号来界定堂名的。显然，这种行内细分堂号的结构模式是与手工业行会内部分工细致、行业界限严明的特点相吻合的。

① 这里的“河南”，是广州人对珠江以南市区的俗称，大致位于今广州海珠区一带。

② 邓铁锋：《广东劳动业务之调查》，《工界》第10期，1920年8月1日，第21、22页。

③ 《车木工人筹组工会》，《广东群报》1921年5月31日，第6页。

④ 《牙擦工人之生活及其罢工原因》，《广东群报》1921年3月29日，第6页。

除东西家分立共处同一行会外，“劳资合行”还有东西家合一的组织模式，劳资不分是其显著特征。<sup>①</sup>如洋服行劳资不分是由于东家多出身工人，<sup>②</sup>革履行则因工人多为“技师而兼东主”，<sup>③</sup>这是身份合流造成的。当然，也有合组会馆致劳资不分的，如油漆行因会馆“系由东西合并设立”致劳资难分；<sup>④</sup>黑骨钮行因东西家共有一总行万福堂而“不分畛域”；<sup>⑤</sup>料珠行亦只有一会所联义堂，“本无东西家之区别”。<sup>⑥</sup>此外，还有从业门槛低下所致，如藤器行“能以短少资本，开店营业，实则工商并施”而“无工人资本之分”，<sup>⑦</sup>机房行则是“有一机头之资本，便可做东家，若一时缺乏，又变为西家”。<sup>⑧</sup>事实上，广州行会“劳资合行”的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早期劳资关系主题，既然劳资间身份认同难以厘定，劳资关系自然就密切，激烈的劳资纷争也就甚少发生。“至于各行工人，每次要求增加工价，及其改善待遇，必于饮馔时期，东西家在行内共同订定，即为了结，绝少因加薪问题，而至罢工。其他迎神赛会舞狮舞龙饮馔等事，属于共同娱乐者，则东西醴资，极为热心。”<sup>⑨</sup>可见，“浑然相处”而“完全无劳资阶级之观念”，<sup>⑩</sup>则为广州传统行会劳资关系的原生态写照。

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社会新思潮和世界革命潮流的浸润与激荡，尤其是1921年5月孙中山政权“保育劳工”政策的实施，<sup>⑪</sup>更直接促使广州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并率先开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的序幕。工潮中，工人多以“组织工会为本营，以同盟罢工为利器”与资本家相争。<sup>⑫</sup>被誉为“新派工会之先驱”的“广州工会运动”遂因之勃然兴起，<sup>⑬</sup>这主要表现为传统行会“劳资合行”的组织结构向“劳资分离”演进，而这种“劳资分离”则以劳方建立脱离行会的新式工会最为典型。新式工会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工人与中国行会制度的决裂，<sup>⑭</sup>但好景不长。至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倒孙后，由于“嫉视而摧残之者甚多，爱护而扶植之者反少”，昙花一现的广州工会运动遂即“沉寂”。<sup>⑮</sup>而“劳资合行”的传统行会特质仍根深蒂固，支配着广州劳资成员的社会生活。不过，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的兴起，却使这种劳资关系的行会特质发生了异变。

① 陈达认为该类型最能代表手工业行会性质，参见氏著：《我国南部的劳工概况》，《统计月报》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12页。

② 《广州洋服工人之状况》，《广东群报》1921年5月26日，第6页。

③ 《革履工人之生活状况》，《广东群报》1921年3月10日，第6页。

④ 《油漆工人状况及其罢工情形》，《广东群报》1921年6月3日，第6页。

⑤ 《黑骨钮行工人生活状况》，《广东群报》1921年3月5日，第6页。

⑥ 《料珠行工人之生活状况》，《广东群报》1921年3月11日，第6页。

⑦ 《藤器工人不愿落后》，《广东群报》1921年6月9日，第7页。

⑧ 《机房行东西家之生活状况》，《广东群报》1921年3月30日，第3页。

⑨ 《广东工界年来之形势观》，《晨报》1922年3月21日，第3版。

⑩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劳工运动史》（一），第39页；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北平：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第1页。

⑪ 参见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4—257页。

⑫ 《广东工潮之观察》，《申报》1922年2月6日，第3张第11版。

⑬ 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第72页。

⑭ Jay Calvin Huston, *The Recent Rise of Labor Unions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Socialism in Canton Under the Aegis of the "Kwo Ming Tang,"* June 26, 1922, Jay Calvin Huston Papers, 1917-1931, Box 6, Folder 1,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p. 2.

⑮ 《广州工商界之现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8号，1922年10月30日，第33页。

## 二、迟滞与凸显：国民革命初期劳资阶级意识的双重变奏

1923年3月，孙中山借粤、湘、滇、桂等联军驱逐陈炯明后，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简称“大元帅府”）。可是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并不稳固，必须“频繁地进行防御战和进攻战”来消除敌患。<sup>①</sup>为了满足军事优先的战略行动，大元帅府不惜滥征捐税，尤其各联军繁征苛敛，更使社会经济生态急剧恶化。<sup>②</sup>这严重危及广州工商两界的生存，并制约了劳资关系走向。针对政府滥征捐税，1923年，广州商界罢市抗税活动陆续发生，而“工人亦与资本家取一致行动”，成为此罢市“最可注目之点”。<sup>③</sup>如9月，省财政厅批裕源公司承办筵席捐，酒楼行商为争回自办，于19日联合西家行罢市抵制，最终赢得自办筵席捐。<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抗税风潮中工人的态度颇为强硬。如酒楼行部分行商因罢业损失很大擅自开市，就由于工人的强烈反对只好停业。<sup>⑤</sup>

酒楼行劳资互助的成功，为广州其他行业抗税树立了典范。1924年4月，大本营财政部宣布征收渡船附加军费。5月6日，在广州商船公会倡导下，渡船劳资4000余人实施罢业抵制。由于罢业影响金融商业甚巨，财政部只得于17日宣告停征附加军费。<sup>⑥</sup>9月23日，广州百余家丸散店因市财政局苛税而宣言罢市，千余丸散工人亦与东家“取一致行动”。<sup>⑦</sup>至10月，广州政府大举化妆品捐。化妆品行商在请愿市财政局无果后遂于10月1日罢市抗争，而榨油、面粉、纸布花、化妆品等行业工人也随之一体行动。至3日，市政厅只得取消税捐。<sup>⑧</sup>以上同盟抗税行动中，工人还是商人的追随者，随后的奢侈品印花税风潮则是由工人主导。1925年3月，大本营财政部宣布征抽金银、珠宝、玉石等11种奢侈品印花税。<sup>⑨</sup>29日，玉石、玛瑙、琥珀、金银首饰等行工人率先发难，要求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财政部长古应芬撤销印花税。<sup>⑩</sup>4月5日，金行、玉石行、金银首饰行、皮革行等行商在总商会倡议下同盟罢市响应。<sup>⑪</sup>22日，金银首饰、

① A. И.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6页脚注1。

② 详情参见《查禁各部队设卡抽税筹饷扰民》（1923年3月至1925年6月）、《各部队被控勒索财物残杀人命》（1923年4月至1925年2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档案，二三〇—042、二三〇—0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冷眼：《非常时代与非常罢市》，《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10月1日，第1张第2页。

④ 《酒楼饭店罢市反对筵席捐》、《再志各行罢市之近状》，《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9月20、29日，第1张第3页；《筵席捐风潮之近讯》，《广州共和报》1923年9月28日，第6页。

⑤ 《酒楼行罢业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3日，第6版。

⑥ 《广州两大罢业之风潮》，《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5月8日，第1张第3页；《渡船加费案已解决》，《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9日，第6版。

⑦ 《中央工人部报告书》，1924年9月23日，汉口档案，汉5540，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下文凡涉及汉口档案，不再注明收藏处）

⑧ 香港华字日报编：《广东扣械潮》第1卷“事实”，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第78页；《化妆品商店罢市抗捐》、《化妆品商店一律复业》，《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4日，第7版。

⑨ 《各项事件传闻录》，1925年3月27日，粤海关档案，94—1—1585，广东省档案馆藏。

⑩ 《广州玉石四行工人等上中执会等代电》，1925年3月29日，五部档案，部8230，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下文凡涉及五部档案，不再注明收藏处）

⑪ 《粤商抗税罢市风潮扩大》，《晨报》1925年4月25日，第5版。

珠宝玉石、玛瑙等行万余工人请愿胡汉民。迫于压力，胡汉民下令暂缓征税。<sup>①</sup>但工人并未停止，仍继续抗争。至5月，珠宝玉石、金银首饰等行工人和广东总工会相继发难，终使财政部撤销金银器、玉器类印花税。<sup>②</sup>由此可见，劳资抗税在广州不再是某一行的个体行为，已出现跨行互助态势，尤其是广东总工会、广州总商会等团体的介入，无疑强固了双方同盟抗税的信心。

抗税事件中工人的助商行为，亦引发时人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担忧：“然而见短的工人，受资本家之驱策”，“而无清明的意识，则劳动阶级的前途，实有莫大之危险”。<sup>③</sup>显然，一味苛责工人“见短”，将其抗税罢工归咎于商人利用不免失之公允，而规避政府滥征捐税以免私利受损，才是双方合作的根本动因。这既是劳资休戚与共的业缘关系使然，也与广州“劳资合行”的行会理念一脉相承。

当然，也有部分行业工界不愿与东家合作抗税，这主要是国共两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如1923年9月，大本营财政部为筹措军饷加征炮竹印花税，炮竹工会工人本已同意与东家行同盟抵制，但因中共领导的广东工会联合会的及时规劝而改弦易辙。<sup>④</sup>炮竹行商联合工人挟制政府的企图落空。1924年6月，广州糖行东家罢市抗议财政部征抽糖捐，尽管经济上“大受牵累”，国民党领导的驳载工会非但未“盲从糖商一致停工”，还自行购糖应市，结果致糖商抗税失败。<sup>⑤</sup>

相对于广州不少行业劳资同盟抗税的经济利益考量，炮竹工会、驳载工会不配合，乃至抵制东家抗税的行动明显是党派政治起了主导作用。类似事例或许尚少，但至少表明此时广州劳资阶级意识并未因抗税风潮中“劳资合行”理念的固化而迟滞不前。其实，大元帅府时期也是广州劳资阶级矛盾因党派政治渗入而激化的前夜。1924年5月，在国民党扶持下，由中共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的成立，<sup>⑥</sup>尤使工人运动如虎添翼。这当然是生性保守、深惧变革的广州商界所不能容忍的，而拥有武力的商团遂成为其应对工界的有力依恃。酒业工潮即是显例。1924年7月，广州酒业工人因生活困难要求东家行福志堂加薪。资方不但拒绝，还指使部分工人另设团体，“以抵抗旧有工会”。<sup>⑦</sup>27日，工人代表会所属酒业工会派员调查工人有无入东家工会时，在东鬼基遭到恒茂、志成信、启昌隆等酒铺“主使商团开枪”，当场击伤3人，棍伤10余人。<sup>⑧</sup>对此，市公安局不仅不缉凶，反以有碍税收为由制止工人罢工。<sup>⑨</sup>事实上，广州政府这种放纵商团武力干涉工潮的姿态，直至商团事件发生才得以改变，而商团事件为深入考察国民革命初期劳资阶级意识分野提供了绝好素材。

① 《广州唐装金银首饰器皿工会致中央工人部呈》，1925年4月，五部档案，部6007；《奢侈印花行商大请愿》，《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3日，第6版。

② 《珠宝玉石金银首饰联合维持会致中央工人部呈》（1925年5月13日）、《大本营财政部致中央工人部公函》（1925年5月28日），五部档案，部6009、部5990；《请撤销奢侈品印花之指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30日，第6版。

③ 瀛洲：《广东劳动阶级的意识》，《社会评论》第11期，1925年5月5日，第4页。

④ 《爆竹类印花税不准撤销》、《爆竹工人不为资本家利用》，《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2、25日，第6版；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劳工运动史》（一），第200页。

⑤ 《糖商罢业之反响》、《驳载工人实行售糖》、《糖商罢业已告解决》，《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5、28日，第6、7、7版；《团粤区委关于广东工农状况的报告》，1924年3月6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2年，第352页。

⑥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劳工运动史》（二），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9年，第287页。

⑦ 《酒业工潮将扩大》、《酒业工人之加薪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8、22日，第7版。

⑧ 《广州酒业工会上中执会代电》，1924年7月29日，汉口档案，汉11674。

⑨ 《飭警制止强逼酒业罢工》，《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4日，第3张第12页。

1924年8月10日,商团首领陈廉伯所运枪械至广州被大元帅府截获后,即以动员全体商人罢市的方式来威迫孙中山政权还械。<sup>①</sup>于是,围绕罢市问题,中共工会与商团展开激烈较量。为更好抵制罢市,8月26日,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以中共党员施卜为首的工团军。27日,500余工团军向省长廖仲恺请愿,要求讨伐商团。<sup>②</sup>这说明,中共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团的矛盾已激化,一场大规模劳资阶级冲突似不可避免。10月10日,工团军等15个社团万余人举行集会,反对商团罢市。会后各团体游行时遭商团袭击,20余人遇害,百余人受伤,145人被捕。<sup>③</sup>孙中山闻悉血案后决意镇压商团。15日,工团军与政府军前后夹击,商团因“首尾不能相顾”而失败。<sup>④</sup>国民革命初期广州劳资阶级意识凸显自不待言。

不过,这种因商团事件引发的劳资阶级意识凸显,相当程度上是孙中山政权为挽救危局而有意促成的,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已认同阶级斗争。当然,这其中既有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积极策动,<sup>⑤</sup>也有国民党的正确抉择。由于中共领导的工人积极参与,孙中山政权在应对商团军事威胁的同时,也认识到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国民党扶助劳工政策亦由策略宣传向真正付诸实施转变,1924年10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行的《工会条例》即是力证。<sup>⑥</sup>此后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导向日渐明显。

### 三、袒工抑商：国民革命中期“劳强资弱”格局的实态演绎

1924年国共合作伊始,“全力助其开展”以“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sup>⑦</sup>即为国民党工运的既定方针。随着国民党政治发展急剧“左”转,<sup>⑧</sup>其“袒工”的政策倾向更趋鲜明,尤其是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注重扶助工人组织,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自然格外迅速”。<sup>⑨</sup>与之相比,商团事件的影响则使国民党对商界仍心存余悸,以至1926年1月通过的国民党二大决议案就隐然有“抑商”意蕴:对于旧商会“须用适当方法,逐渐改造”,而对革命商人“则当以特殊利害向之宣传”,“使之参加国民革命”。<sup>⑩</sup>显然,国民党“袒工抑商”政策的形成是基于工商两界对国民革命的不同态度为考量的。

国民党“袒工抑商”政策的施行,自然暗合了中共阶级斗争的固有理念,并使之更趋强固。

- 
- ① 《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5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2页。
- ② 《农工两军均准立案》、《工团军巡游请愿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28日,第8版。
- ③ 《广州反帝大联盟等三十个团体为抗议商团军屠杀双十节示威的市民告国民书》,1924年10月11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97—500页。
- ④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劳工运动史》(二),第320页。
- ⑤ 详情参见敖光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 ⑥ 其内容详见《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28号,1924年10月10日,第5—10页。
-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7、88页。
- ⑧ 杨天宏:《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 ⑨ 《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1927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1页。
- ⑩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

如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强化工人对资本家“绝不让步”的阶级斗争决议。<sup>①</sup>5月在广州召开的由中共主持的全国劳动大会则强调工会组织要有“坚决的阶级行动”，<sup>②</sup>同时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工人开展阶级革命。而后中共领导的省港罢工及工人纠察队的设立，亦为其在广州开展阶级革命提供助力。<sup>③</sup>于是，中共阶级斗争理念与国民党“袒工抑商”政策合力，使国民革命中期广州“劳强资弱”关系格局生成。这从中共广东区委有关工运过激行为的报告中可得到证实：

在广州举行罢工很普遍，在每次武装冲突中，封闭商店成为必要的措施。……因此小商人和小贩非常不安，社会人士对工人们更为讨厌。这就是为什么在广州特别有关于共产党的谣言的主要原因。<sup>④</sup>

类似有关广州工人运动过激的看法，在当时的报纸舆论中亦有反映：“粤中自共产党执政而后，各业工会，均为共派中人所把持。于劳资双方，原无恶感者，则务挑拨之。于争持问题，原无罢工之必要者，则务煽成之。共党煽惑于下，政府纵容于上。粤中工会，遂成为天之骄子，享特殊阶级之待遇。受特殊法律之保障。一切法律典章，其效力不能拘束工会。”<sup>⑤</sup>这明显带有诋毁中共工会运动的意图，但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广州工人运动的过激行为。鉴于工人运动的偏激态势，1926年4月，中共与粤省政府亦力图纠偏，但效果不彰。<sup>⑥</sup>其后广州工人运动激进态势依然持续，封店拘人之事时有发生。如6月，广州酒楼茶室工人要求独享杂钱、花果，在遭东家行拒绝后，派武装纠察队封锁了数十家门店。<sup>⑦</sup>

随着国民党“袒工抑商”政策的推行，以及中共阶级革命理念的输入，这一时期广州工人阶级意识颇有提高：摆脱“劳资合行”的组织形态，建立完全脱离资方不受其控制的纯粹工会组织，已成为此时广州工人阶级觉悟的真实写照。“自纯粹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后，依照工会条例规定，工会与雇主立于对等地位，东西合组之行会当然不能适应现代之要求，觉悟工人自行联合组织纯粹工会脱离原有之行会，系受时代之驱使，亦即工人阶级进步之表征。”<sup>⑧</sup>不过，这也为政治上居于“弱势”的商界利用“劳资合行”理念，组织御用工会造就了机遇。至其组织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

巧立名目，私组工会。如1925年8月，广州牙擦行工人自组广东牙擦抵扫工会。东家行闻悉，即组牙擦抵扫善育工会来抵制。据悉，该善育工会“系冒借工会名称”而“保存东行占优势之行会”。与牙擦行相似，广州天窗工会的成立，亦遭东家行源顺堂所组广东天窗联合总工会

①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20页。

③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1925年7月、10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1982年，第32、84页。

④ 《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1926年夏，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343—344页。

⑤ 《广州工人以暴力占领商店》，《晨报》1926年4月30日，第5版。

⑥ 《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1926年夏，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344页；《农工厅严禁工人骚扰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7日，第11版。

⑦ 《广州酒楼茶室商业公会上总司令呈》，1926年7月17日，五部档案，部8619。

⑧ 《广东农工厅致政治委员会函》，1926年7月8日，五部档案，部0456。



的阻扰。<sup>①</sup> 1926年春,广州遮业工会亦为广东制遮工会所破坏。据查,该制遮工会“系原日联益堂东家旧行底之变相”。<sup>②</sup> 5月,广州香行工人成立广东香业工会,东家行知悉,即伪造图章私组广州制香联合总工会。<sup>③</sup> 6月,广州酸枝花梨行的箭头行、抖行两工会亦遭东家所设打磨工会的侵扰。据悉,该打磨工会系由酸枝花梨行48家店铺以“劳资合作主义”所组的商业维持会演变而来。<sup>④</sup> 此外,药材工会、帐联同业联合工会、经纶店员工会,亦遭东家私设的熟药工业研究会、帐联屏轴同业工会、绸缎职工会的抵制与破坏。<sup>⑤</sup>

入侵工会,以图控制。如广东棚行联益工会就混有东家分子,系东西家合组而成。<sup>⑥</sup> 广州店员工会亦“系三数东家分子从中把持”。<sup>⑦</sup> 须指出,此类工会组织不纯,会务多由资方主导。以标榜“与东家素有感情,向来互相维系”为宗旨的广州故衣店员工会可称典型。1926年5月该工会成立后,主持会务的七位执委中就有周叔卿、黄耀、冯日如等六位资本家。由于资方操纵会务,该工会对于“工人利益则置若罔闻,对于东家利益则极力维护”,甚至开会时不准工人发表意见,“稍有不顺则以开除为要挟”。<sup>⑧</sup>

笼络收买工人,成立工会。如1925年5月,锦纶行工人组建广东锦纶织造工业联合会,资方则策动部分工人另组广东锦纶织造提花铁机行,“意图分擘”。<sup>⑨</sup> 广东土木建筑总工会成立后,亦遭东家收买工人所设的建造联合会的嫉视。11月16日,在资方指使下,建造联合会五六百人,手持木棍、剑仔<sup>⑩</sup>当场打死建筑总工会会员2人,伤10余人。<sup>⑪</sup> 1926年2月,广州柴炭工会的成立亦遭东家收买少数工人组设的柴业职工工会的“立意破坏”。<sup>⑫</sup> 3月,茶行西家集成堂改组为广东茶业集成总工会后,茶商即串通部分工人,成立广东茶务铺面店员工会,以示抗衡。<sup>⑬</sup> 4月,广州革履工会要求加薪不遂罢工后,该行东家则“利诱小部工人,组织劳资协进会”自行做工。革履工会派员调查,4月26、27日,相继遭到协进会截击。5月13日,革履劳资协进会因“非法举动”被农工厅勒令解散。<sup>⑭</sup>

上述资方组织工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所引发的工会纷争,在广州“非常普遍”。<sup>⑮</sup> 时任粤省农工厅长的陈公博在论及广州工会纠纷原因时认为,“十件斗案,半与东家有关”。<sup>⑯</sup> 可见,对

① 《广东农工厅致政治委员会函》,1926年7月8日,五部档案,部0456。

② 《广州市工人部长陈其璜致中央工人部函》,1926年11月2日,五部档案,部7425。

③ 《中央工人部致广东工人部函》,1926年6月13日,五部档案,部0447。

④ 《酸枝花梨、箭抖两工会通电》,1926年6月20日,五部档案,部7214。

⑤ 《广州药材工会上中央工人部呈节略》(1925年8月)、《中央工人部致广州工人代表会函稿》(1925年12月22日)、《广东省工人部工作报告》(1926年2月),五部档案,部7113、部6807、部10965。

⑥ 《广东棚行正义工会致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函》,1926年3月20日,五部档案,部6842。

⑦ 《中央工人部致中央秘书处函》,1926年1月5日,汉口档案,汉0848。

⑧ 《中央工人部致广州工人代表会函稿》,1926年6月9日,五部档案,部7765。

⑨ 《广东锦纶织造工业联合会致中央工人部函》,1925年5月22日,五部档案,部0338.1。

⑩ 剑仔系粤语对匕首或短剑之类兵器的称谓。

⑪ 《广东各界工人反对奸商工贼摧残工会、迫害工人举行罢工情形》,1925—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档案,十九(2)—18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⑫ 《广州柴炭工会致中执会等代电》,1926年2月20日,五部档案,部7164。

⑬ 《中央工人部致广州工人代表会函稿》,1926年3月9日,五部档案,部6839。

⑭ 《广东农工厅致政治委员会函》,1926年7月8日,五部档案,部0456。

⑮ 《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1926年夏,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343页。

⑯ 《陈公博高谈工会纠纷原因》,《讨赤旬报》第3期,1926年7月21日,第60页。

工会组织的争夺已成为广州劳资纷争的主要内容，这可谓是阶级斗争与“劳资合行”理念交锋的直接反映。据悉，广州商人共组成 26 个雇主工会，皆属于国民党右派的广东总工会。<sup>①</sup>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行会型工会，<sup>②</sup> 广东总工会向以标榜“提挈工界旧行头”、“排除工人纠纷劳资争斗”为宗旨，自然奉行的是劳资合作。<sup>③</sup> 显然，这与广州工人代表会的阶级斗争理念背道而驰。这样，随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共党争的激化，这两大工会间的派系纷争亦与日俱增。据统计，仅 1925 年 7 月至 1926 年 6 月，广州就发生两大工会间的械斗 54 次，“且很少有不死人的”。<sup>④</sup> 这无疑产生了严重后果，不仅影响社会秩序，而且危及劳资关系稳固，令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陷入濒临破裂的危境，这对执政广州筹谋北伐的国民党而言，是极不愿意看到的。由是观之，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转向也就指日可待了。

#### 四、袒商抑工：国民革命后期劳资关系格局的权势转移

自 1926 年 7 月出师北伐后，国民政府便迎来“袒工抑商”劳资政策转向的拐点。究其缘由，除前述广州工运偏激行为尤其是工会派系纷争严重威胁战时后方秩序外，也与此时期国共政争、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态势消长密切相关。由于扶持工人运动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主力参加北伐，治粤军政大权遂完全落入国民党右派之手，这自然导致广州工人运动形势的逆转，而禁止工人械斗便是其维持战时后方秩序的首要举措。8 月 6、7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相继通令禁止工人“聚众携械斗殴”和“结队持械游行”。<sup>⑤</sup> 诚然，当局为巩固社会治安禁止工人械斗无可非议。但问题是，这些禁令多是一纸具文。因党派政治的渗入，广州工会纷争比以前更剧烈，“各工会工人发生持械斗殴，动辄纠众千数百人，不服警察制止，以致伤毙人命之事层见叠出”。<sup>⑥</sup> 且械斗完全按巷战方式进行，在巷战中，“国民党右派无疑支持广东省总工会”及“广东机器工会”。<sup>⑦</sup> 事实上，这些右派工会及其雇主已与粤当局结盟，“形成一个旨在摧毁广州工人代表会的统一战线”。<sup>⑧</sup>

正是得益于广州当局的袒护，国民党右派工会与其雇主紧密合作，以武力干涉中共工会运

- ① C. 达林：《工人的广州》，1927 年 4 月 3 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 1 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第 327、328 页。
- ② Sydor Stoler,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Canton*, *The Pan-Pacific Worker*, vol. 1, no. 6, September 15, 1927, Jay Calvin Huston Papers, 1917-1931, Box 6, Folder 1,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p. 21.
- ③ 《广东农工厅致政治委员会函》，1926 年 7 月 8 日，五部档案，部 0456。
- ④ C. 达林：《工人的广州》，1927 年 4 月 3 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 1 辑，第 330 页。
- ⑤ 《昨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决工人纠纷案》、《总部严厉制止工人斗殴》，《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8 月 7、10 日，第 3、10 版。
- ⑥ 《广州市公安局报告工人在市内活动情形》，1926 年 11 月，广州国民政府档案，十九（2）—18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⑦ C. A.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96 页。
- ⑧ Sydor Stoler,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Canton (II)*, *The Pan-Pacific Worker*, vol. 1, no. 7, October 1, 1927, Jay Calvin Huston Papers, 1917-1931, Box 5, Folder 4,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p. 17.

动的事件不时发生。如1926年7月13日,广州工人代表会所属广东牙擦抵扫工会派人征求会员时,被善育堂东家李国兴纠集牙擦抵扫善育工会会员当场殴毙2人,伤10余人。事后,广东总工会理事长陈森被控是肇事东家的主要包庇者。<sup>①</sup>7月29日,广州菜栏工会要求减少工时,亦被资方指使御用工会菜栏职工总会数十人持刀枪棍棒殴击,伤10余人。<sup>②</sup>翌日,菜栏工会即纠合广州工人代表会所属数十工会“托言维持复工”,实行封锁菜栏,并围困职工总会。<sup>③</sup>工人代表会对菜栏工会的援助,令其劲敌广东总工会也难以置身事外。31日,工人代表会派维持队协助菜栏工会复工,广东总工会数百人亦持械蜂拥而至,在长堤一带寻杀菜栏工会会员,并缴去工人代表会维持队旗帜。<sup>④</sup>9月,广州酱料凉果杂货工会工人要求资方加薪,东家行联志堂即雇纠察50余人,胁迫同业罢市抵制,同时又派御用仁德工会体育队百余人,分头截击酱料凉果杂货工会工人,于27日当场重伤5人,掳去3人。<sup>⑤</sup>

对于广州商界与国民党右派工会的联合攻势,中共工会及其武装纠察队自然是针锋相对,“封锁商店及工厂不使营业,或作铲除东家工会运动”。<sup>⑥</sup>职是之故,盛极一时的“工人恐怖”论因广州商界的散布而蔓延开来。达林认为,“工人恐怖”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企业主无法同个别工人打交道而只能同整个工会办交涉。由于害怕组织起来的工人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企业主或者散布谣言说工人进行恐怖活动,或者逃往工人组织程度较差、工资还比较低的县城。这就是所谓工人恐怖活动的真相。”<sup>⑦</sup>至1926年10月,广州商界“更起劲地散布‘工人恐怖’”论。<sup>⑧</sup>当然,商界的“工人恐怖”论并未停留在舆论层面。22日,广州总商会、广州市商会、广州商民协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就工界封店拘人,联衔请愿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颁行劳资法规以除纠纷。<sup>⑨</sup>针对商界请愿,中共工会也不示弱。11月2日,广州工人代表会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陈商界“完全颠倒事实”,并指摘当政主管机关“多昧于事实,往往袒护雇主而压迫工人,甚或出之文告派会军警强行遏制罢工之行动,此不独有违扶植工农之政策,抑亦出乎常情之外”。同时还对工人罢工封店予以解释,认为罢工是反抗商人压迫的正当之举,“雇主方面往往先发制人,不待工人之罢工,即自行罢业以为胁迫”,“雇主压迫至此,工人虽欲不罢工而不可得,及至工人实行罢工之时,则雇主更出其破坏之辣手,或组织御用工会以为抢夺工作;或纠合地痞以殴打工人”。据此,其进而强调:“工人如不封锁商店,绝无法以促东家之觉悟,即工人亦将无以自保,是封锁商店诚为工人保障罢工之自卫行动,工人罢工有绝对之自由。”<sup>⑩</sup>然而,中共工会的上书自辩,未能得到国民党中央的理解与同

①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总司令呈》,1926年7月16日,五部档案,部6910。

② 《广州菜栏工会致中央工人部等代电》(1926年7月30日)、《广州菜栏工会上中央工人部呈》(1926年9月14日),五部档案,部7251、部8989。

③ 《广州市菜栏职工会执会致中执会呈文》,1926年8月10日,汉口档案,汉11341.1。

④ 《广州工代会上中央工人部呈》,1926年8月1日,五部档案,部7252。

⑤ 《广州酱料凉果杂货工会上中央工人部呈》,1926年9月28日,五部档案,部9014。

⑥ 《工人运动报告》,1926年12月,中共惠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刘尔崧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

⑦ C.达林:《工人的广州》,1927年4月3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24页。

⑧ 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94页。

⑨ 参阅《四商会议定劳资法规之内容》,《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2日,第10版;《中常会致劳工法讨论委员会函》,1926年11月9日,汉口档案,汉11438.1。

⑩ 《广州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鲍武等上中执会函》,1926年11月2日,汉口档案,汉11438.2。

情。此后，抑制工人运动的发展成为国民党应对劳资纷争的基本理念。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其后，国民党“袒商抑工”的劳资政策导向愈益明朗，粤当局与工人的关系“明显疏离”。<sup>①</sup>1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工人纠纷问题议决案：（1）不许工会擅自拘人；（2）厉禁持械游行；（3）工人不得擅自封锁工厂与商店，东家亦不得无故关闭工厂及商店；（4）工人不得向工厂或商店强取一切杂物。<sup>②</sup>国民党劳资政策的转向，显然深含遏制“工人恐怖”的用意，自然遭到中共工会的抵制。12月20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就国民党“抑工”决策向广东省政府申诉，强调“因罢工而间或有拘人之行，封锁工厂或商店之举”，“皆为特殊环境所迫成，更非工人之所愿为也”。<sup>③</sup>显然，工人代表会对其过激行为并不否认。尽管其就此一再解释，但终无济于事。1927年1月5日，粤省政府颁行的《广东省暂行解决工商纠纷条例》则明显偏袒商界：如对商人除规定罢工时可自行操作，歇业须补工人一月薪金等外，最严厉的不过是不得搀设工会和指使贿买他人加重纠纷；而对工会除严格限制其会费、基本金征收外，还规定不得强征会员及抽收商家买卖货品的佣金，并厉禁擅自拘人、持械巡行、携取商家物品、封锁商店与工厂等不利于商界行为。<sup>④</sup>须指出，该条例的颁行得到了广州商界的拥护，而广州工人代表会对此商议亦仅是“略有增删”。<sup>⑤</sup>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代表会一改往日强硬姿态，中共工运策略调整应是主因。为缓和劳资剧烈冲突，维系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此时中共开始放慢工人运动的激进脚步。1926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区委的信中就明令“工人纠察队直接封闭商店的举动须极力制止”，<sup>⑥</sup>并在粤区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揭示了其调整工人运动政策的隐衷：由于“地位困难”，“正苦于无法阻止工人群众目前过分的行动”，“现时政府所颁的四个办法（指前述工人纠纷问题议决案，——笔者注），形式虽是反动的，实质却替我们解决了很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此办法应当承认”。<sup>⑦</sup>

可是，中共工运政策的调整实效相当有限，广州劳资阶级纷争的激化态势并未因之而有多大改观，相反却使国民革命后期商界地位日渐凸显。加之国民党“袒商抑工”政策的实施，广州“劳强资弱”关系格局遂向“资强劳弱”态势演变。这可从1927年3月国际劳工代表斯托拉（Stoler）对曾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陈树人的访谈中得到印证。陈树人在被问及国民政府的工运政策时说：“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后，广州商人和资本家在对抗工人的活动中，显得非常积极与无畏，他们要求政府不要迁就工人和工会。”而当斯托拉问及广州工界对国民党“抑工”政策的反应时，他回答：“据我们所知，工会方面并未反对这些限制性措施，还没有一个工会对此抗

① Sydor Stoler,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Canton (II)*, p.16.

② 《广东省政府委员会布告第714号》，1926年12月，《广东行政周刊》第1期，1927年1月3日，第48、49页。

③ 《广州工人代表会对政治会议最近关于工人事件决议案上省政府书》，《人民周刊》第36期，1926年12月30日，第4页。

④ 《省政府暂行解决工商纠纷条例》，《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第4版。

⑤ 《商民代表大会之第二日》，《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第9版；《广州工商纠纷解决法》，《申报》1927年1月11日，第2张第5版。

⑥ 《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局的策略》，1926年12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74页。

⑦ 《中央对于粤区政治报告的决议》，1926年12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92页。

议,许多工会领导人自身已意识到此时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同时他也承认,广州商人“正利用这种形势来向工人和工会进攻”。<sup>①</sup>陈树人的谈话自然有着为国民党“袒商抑工”政策辩解的用意,但也折射出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劳资关系格局的转变。至1927年4月国民党在广州清党后,中共领导的工会运动惨遭镇压,“东家更将所有一切条件推翻”。<sup>②</sup>此后,类似传统行会时期资方主导型劳资关系格局复现广州,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概言之,以国共合作与党争为主线,这一时期广州劳资关系因党派政治的强力渗透而愈加错综复杂。可以说,国共两党的党派政治构成了此时广州劳资关系变动的政治背景,并起着加速催化的作用。众所周知,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皆以革命党著称,共同的革命目标终使两党暂时走向合作,但在阶级基础认知层面,两党毕竟有着迥异的政治理念。两党政治理念的歧异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而日趋尖锐,且逐渐成为国共关系的主题基调。而这必然影响革命统一战线的暗流涌动,甚至汹涌澎湃,这在劳资关系方面尤为显著。当然,针对因党派政治影响所带来的日趋激化的劳资阶级纷争有可能造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分裂的威胁,国共两党也并非一味固守其阶级政策的固有理念,而是根据各自利益进行了适时调整。这样,客观上也就促成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劳资关系格局由劳方向资方的权势转移。

## 五、分析与思考

依上述史实,或可归纳出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变动的基线轨迹及特点。至少在国民革命兴起前,广州劳资关系仍以“劳资合行”的社会经济属性为主,并未完全突破行会藩篱。恰如全汉升所论,“在这样工商的组织下,阶级意识是不会产生的”,“阶级意识既没有,劳资的阶级斗争自谈不到,从而政治上便可安宁无事”。<sup>③</sup>然而,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党化渗透,尤其是商团事件后国民政府“袒工抑商”政策的施行,其后“广州劳工运动的发展,受政治的影响最大”,并迎来“最澎湃的时期”,<sup>④</sup>“在这一个时期,罢工次数很多,劳资的感情非常恶化”。<sup>⑤</sup>广州劳资阶级斗争格局遂正式形成。至此,广州劳资关系亦由“劳资合行”的行会特质演进至盘根错节的党派政治模式。尽管这一演进的完成不过短短几年,具有剧烈易变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广州劳资关系的动态演绎中去寻觅其固有的内在变动理路。

从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特质,向党派政治属性的演进中不难发现,其始终蕴涵着“劳资合行”与阶级斗争两种劳资关系主题。当然,这两种主题并非固化,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发生波动。不过,就总的趋势来看,劳资协商合作是主要的,对抗则是次要的。如果说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和中共阶级斗争的渗透,是推进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促变”的直接诱因,那么以下“滞变”因素则使其呈现出“不变”的特点,并使传统行会“劳资合行”的协商合作主题往往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广州劳资双方的主要价值取向。

首先,劳资关系社会经济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协商合作主题形成的可能性。劳资关系作为

① Sydor Stoler,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Canton (II)*, p. 17.

②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报告——关于国民党反动之后广州工人情形》,1928年1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3,1982年,第237页。

③ 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第199、200页。

④ 余启中:《民国十二年及廿二年广州劳资争议底分析》,第1、4页。

⑤ 陈达:《我国南部的劳工概况》,《统计月报》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第2页。

一种以双方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与存在基础的社会关系，通常含有两种迥异的经济利益诉求：就劳方而言，资方若能及时提高工资待遇自是最好不过，而资方当然是期望劳方尽可能减少工资待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取更多利润。劳资双方这种对立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上述利益诉求的实现往往会有一个艰难曲折的博弈过程。而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首选是劳资协商。不过，协商一旦破裂，罢工便成为工人挟制资方的杀手锏。而后，双方视罢工所产生的后果权衡利弊，或自行妥协了结，或诉诸第三方调停解决。当然，选择后一种方式对劳资双方来说实属无奈之举。因为罢工意味着停业，这势必危及生产的正常进行，不仅劳资双方的经济损失难以预料，也不利于行业内部及社会秩序稳定。其实，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劳资双方都很清楚，倘若争议中一味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结果不免两败俱伤，而唯有劳资协商合作，方能实现劳资关系和社会生产正常运行。以上这种劳资协商合作主题，不仅时常呈现于广州传统行会时期，就是国民革命时期也不例外。据时人对1923—1927年广州222件劳资争议调停的分析，这些争议主要是由农工厅等第三方调处和劳资双方直接协商来解决，其结果也多是以劳方要求得到资方完全接受或部分承认而了结。<sup>①</sup>须指出，这些劳资争议调解中所展现的协商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共生性所决定的。尽管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党派政治属性愈益突显，但主导其变动的最终因素仍是双方的经济利益，前述广州劳资借行会力量同盟抗税即是明证。

其次，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策导向是广州劳资关系协商合作主题生成的政治保障。综观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劳资政策由“袒工抑商”至“袒商抑工”转变，主要是其革命党与执政党一身二任的角色定位所致，也是其阶级调和理念的最终使然。革命党的政治认同使其在广州选择革命群众基础时，由于商人先天政治保守的革命绝缘性，而自然更优先倾向于动员深具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国民党“袒工抑商”的政策导向则是这种倾向的集中体现。而此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助长了劳资阶级斗争事件的滋生，尤其工运左倾错误更加剧劳资关系的紧张，并危及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稳固，而这与国民党维系战时后方秩序为己任的执政党的角色认同不免相悖。此时，作为执政广州的国民党，最为看重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固，自然不愿意激烈的劳资阶级斗争发生。于是，针对这种来自革命党角色定位所引发的劳资冲突有可能危及其统治秩序的危险，国民党阶级调和的执政党理念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其“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转向即是当然。其实，促使这种劳资政策转向的，还有国民党对广州商人受商民运动党化而支持革命的经济思虑，<sup>②</sup>更重要的还是对中共阶级革命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政治担忧。对此，深谙广东工人运动工作的陈公博曾这样评论道：

在广州时候，无日不看见工会分裂，工人罢工，我在农工厅时候，门口排列行打行的工人请愿，是日常司空见惯之事。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不经过考虑的，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抓工人，势不能不煽动罢工……广州既是国民政府的治下，而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那么政府维持秩序的作用已完全失掉。这样情况慢慢

① 笔者依据余启中《民国十二年至廿二年广州劳资争议底分析》第13、19、27页信息整理。

② 据悉，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大商人为北伐军需提供了600万元的财政支持。参见Sydor Stoler,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Canton (II)*, p.17.

恶化，于是变成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不革命的了。<sup>①</sup>

陈公博的上述评论，尽管带有强烈诋毁中共工人运动的色彩，却也真实道出了中共阶级革命与国民党执政党角色定位的矛盾与冲突，这实质上是阶级斗争与协调两种劳资关系理念在国共党争中的真实写照。其实，国民革命后期中共也意识到阶级革命所带来的激烈的劳资冲突，有可能造成危及国民党统治秩序进而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后果，故也曾主张一定程度的劳资合作，试图缓和阶级矛盾。尽管如此，由于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与政见的迥异，国共合作的破裂亦是不可避免。这样，随着清党后中共势力在工人中的影响锐减，广州劳资阶级斗争态势自然也就弱化，其协商合作主题复居于常态，“广州劳工运动渐入于沉静时期”。<sup>②</sup>

此外，广州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顽强延续也是其劳资关系协商合作主题形成的要因。国民革命时期，广州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以传统商业、手工业为主，“用机器的新工业寥寥无几”。<sup>③</sup>而此种颇具传统色彩的“社会经济之形态，足以决定劳工运动之趋向”，<sup>④</sup>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广州工人的阶级意识与行动始终受到来自行会制度、农业社会等传统因素的影响和支配。<sup>⑤</sup>正因为这些传统因素的长期浸染，广州工界内部分争亦随之加剧。尤至国民革命后期，这种“行会的恶作剧”<sup>⑥</sup>又时常演化为激烈的武力械斗，<sup>⑦</sup>这势必严重危及广州工人整体阶级观念的生成，自然也就阻碍了其阶级觉悟的提升。诚如中共工运领导人邓中夏所分析的：“为什么广州工人没有阶级觉悟呢？因为广州新式产业工人很少，大多数都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对于阶级之认识很难，”“广东旧有械斗的风尚，他们受其熏染甚深。”<sup>⑧</sup>

如果说邓中夏所论的广州手工业工人由于“旧行会遗传性太深”，<sup>⑨</sup>其阶级观念模糊尚可理解，那么被中共视为最具阶级意识的产业工人，其阶级觉悟程度在广州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广州产业工人也深受行会制度和农业社会关系的熏染而难以自拔。在广州产业工人中居主导地位且深具行会制度渊源的机器工人堪称典型代表。<sup>⑩</sup>“机器工人仍与小生产的农业社会有关系，即其家庭亦为农民家庭。因此农业社会之地方主义思想，仍旧存在于产业工人之脑海中，产业工人亦往往有地方之组织”。<sup>⑪</sup>于是，地方主义观念、行会制度渊源以及自身优越的经济地位，共同造就了广州机器工人独立的“工人贵族”身份特征。“正是这群工人贵族组成机械[器]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不是加入阶级的工会，而是追随国民党右派。”<sup>⑫</sup>这样，“劳资合行”的行

① 李鐸等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一九二五—一九三六）》，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第46—47页。

② 余启中：《民国十二年至廿二年广州劳资争议底分析》，第1页。

③ 《广州市的工业》，《广州市市政公报》第268号，1927年9月10日，第2页。

④ 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上册，第1页。

⑤ 参见《广东职工运动》，1926年5月，中共惠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刘尔崧研究史料》，第145—146页。

⑥ 傅筑夫：《中国社会问题之理论与实际》，天津：百城书局，1931年，第331页。

⑦ 参见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第483页。

⑧ 《评广州工会之争》，1926年3月7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邓中夏文集》，第234页。

⑨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1925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67页。

⑩ 参阅 Paul Scharrenberg, *China's Labor Movement, 1931*, p.4.

⑪ 《工人运动之经过》，《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1926年4月10日，第54页。

⑫ 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1927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7页。

会理念依旧在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团中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国民革命时期中共的阶级动员一直遭到这些践行劳资合作的行会型工会的冥顽抵制。<sup>①</sup>

除社会传统因素阻滞广州工人阶级觉悟提升外，中共自身阶级动员能力的不足亦不容忽视。正如1926年夏中共广东区委所报告的：“我们的负责同志只在办公室中进行工作，没有主动地与工人群众进行接触”，“直至目前为止，广州的十五万工人中只有三百名党员”，可见，“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地领导工人群众”。<sup>②</sup>加之国民革命后期，中共为缓和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日益激化的阶级纷争，在劳资政策上进行了由激进至和缓的策略调整，这就使得其阶级斗争理念很难广泛渗透到工人中去，自然也就束缚了其阶级动员的手脚。“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足够明确的布尔什维克方针来对待工会运动和对待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建成的工人群众组织。许多地方的产业和手工业工人行会组织，依然在国民党官僚，甚至是在买办阶级走狗（如广州机器工人工会）的影响之下。我们共产党却对这种状况安之若素，不去争取这些组织中的群众，也不把行会组织改造为产业工会。”<sup>③</sup>曾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的这番评论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工人阶级动员能力的局限性。

总之，以上这些“滞变”因素共同制约着广州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劳资间的阶级意识分野；使其时常呈现出协商合作的主题。如此看来，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工人阶级并未完全脱离资方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为阶级”，中共对广州工人进行政治与阶级动员的难度可想而知。行文至此，似有必要对那种将五四时期视为中国工人阶级完成由“自在”向“自为”转化的传统观点予以重新审视。不可否认，就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转化而言，党派政治、社会思潮、民族主义运动等外因催化固然重要，但社会传统惯性尤其是“工会中旧行会的积习甚深”<sup>④</sup>的内因制约也不可轻视，而“劳资合行”理念对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便是很好的说明。事实上，至20世纪40年代，行会理念仍对中国工人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国民党工运领导人马超俊有精当的观察：“虽然，行会之前途，固日趋没落，此种现象，以工商发达之各大城市，最为显著，但交通闭塞之内地，工商业无若何改进，大体在职业上至今并未变更生产之形式，故其组织，仍多保留行会之固有形态与精神，丝毫无改。吾人置身内地，即可见各地之公所会馆，依然触目皆是，其数量犹多于工会。再以各大城市论，各业工人，亦仅有将公所改为工会，而其内部，并无变动。甚或因习惯已久，不能骤然废弃其传统之组织，仍沿用公所会馆之名称者亦多。”<sup>⑤</sup>诚如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化的传统观点或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作者霍新宾，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武雪彬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参阅 Edward H. Lockwood, *Labour Unions in Canton*, p.399.

② 《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1926年夏，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345、346页。

③ 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193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册，第486页。

④ 《职工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03—204页。

⑤ 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上册，第78—79页。



*Five Princes during Emperor Taiwu's Reign*. When the Rebellion of the Six Frontier Towns broke out, Prince Guangyang, Yuan Yuan, who had been ordered to undertake a military expedition to the north, tried to realize his personal political ambitions through his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forces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 Towns. Despite his death at the hands of Ge Rong, the Northern Wei court considered him to have surrendered to the rebel army, so his family was severely punished.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his epitaph was composed. After the Heyin Incident, however, Yuan Yuan's family returned to the political arena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ew powerholder, and he was rehabilitated.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context of Yuan Yuan's epitaph as compared to the *Biographies of the Five Princes during Emperor Taiwu's Reign* account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exts.

#### **A Study of the Ordo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Liao Dynasty**

Yu Wei(54)

In the Liao Dynasty, *Ordo* denoted the Emperor's travelling palace during his seasonal progress across the realm. However, the word can also connote a military force directly under the Emperor and all its manageri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is force could be made up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including cavalry. It was administered through a variety of units known as *Shilie* (石烈), *Moli* (抹里), *Wali* (瓦里), *Zhasa* (阏撒), etc., all of which were subject to the *Tixiasi* (提辖司 Commandant). The Commandant, who had a fixed residence, was responsible for routine maintenance of all households under the *Ordo* and ensured the system's smooth operation. In the Liao Dynasty,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and households under the *Ordo* underwent a process of relocation to the south, indicating a shift in the *Ordo*'s main function from "control of the interior" to "defense against external threats." However, right to the end of the Liao Dynasty, the *Ordo* never belonged to the governmental system headed by the two Bureaus of Military Affairs—it remained under the direct control of the Emperor.

####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c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in the Mid-19<sup>th</sup> Century**

Hao Yufan(70)

The mid-19<sup>th</sup> century was a period of US expansion in East Asia.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call of the US consuls in Macao reflected US political expansion and its commercial colonization of East Asia as well as trends in Sino-US relations. The placement of US consuls in Macao originated in the US strategic need f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in the reg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also conformed to Macao's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Similarly, their recall was a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East Asia and of Macao's declining economy, as well as of changes in Sino-US relations. The consuls' placement in Macao and their recall reflects not only US expansion in Asia as it adjusted its strategic dispositions in East Asia, but also the impact on Macao of the forced opening of China's hinterland and the rise of Hong Kong.

#### **The Guild Concept,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Party Politics: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Era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Huo Xinbin(84)

"The coexistence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a single guild" was a symbiosis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one guild. This guil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ith its “commun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determined the emergence of the themes in the traditional labor-capital relationship in Guangzhou, a relationship in which both parties “got along” with “no concept of class consciousness.” However, due to political penetration b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began in 192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n Guangzhou began to evolve from the “labor-capital coexistence” of the guild to party politics.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versus class struggle now became the twin theme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ut the themes were not fixed, but fluctuated with changes in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The evolution of these themes led to changes in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mid the realities of a power shift from labor to capital. This affords us a glimpse of the complex interest game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around the issues of labor and capital during the era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of the many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split in the class-consciousness of capital and labor dur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uild.

### **The Change in Policies on Tax and Corvée Exemptio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ssyrian Empire**

Guo Honggeng(100)

The Assyrian empire tax and corvée exemption policy was a strategy aimed at enabling the rulers to safeguard their regime by economic means. Relief from taxes and corvée was a privilege enjoyed only by a few nobles rather than one shared with the whole people, and served as a tool for the king’s political games with different parties in the ruling cla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pire’s politics and economy l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different groups within the ruling class and to constant changes in the manner, contents and beneficiaries of tax and corvée exemption. The policy enabled the rulers to win over different parties,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syrian empire. In the late empire,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the military nobility, the policy of exemptions became a tool for powerful ministers’ manipulation of political affairs. This intensified fiscal problems, deepened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ultimately worsened political turbulence. In short, changes in the tax and corvée exemption policy of the Assyrian empir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empire. The wise use of this policy was conducive to the empire’s stable development, but its abuse led to the empire’s fall.

### **A Study of Maruyama Masao’s “Prototype”**

Han Dongyu(119)

Maruyama Masao’s “prototype theory” attempts to abstract “a formula that can answer all questions” for Japa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Tao. The only thing is that to do so, he has to start from first principles to infer, by “observing the present to know the past,” what is in some sense a predetermined conclusion. In this design, Confucianism, the traditional core of Chinese thought, is made the antithesis of intrinsic Japanese values, while the “prototype” endows Japanese “uniqueness” with a “self-evident nature” that is not susceptible of study. However, over the years, many Japanese scholars have brought out solid factual and logical evidence that clarifies this “self-evident” premise. We hope to bestow on this topic some necessary balance in correcting the “new theories” proposed by Japanese academics through a renewed examination of the “prototype” behind the “prototype theory” on a large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